

和谐社会的背景

和



构建和谐为何提上中央议事日程？

覃 雪

可以说，这十几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2003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现时期”，经济社会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党中央在这样一个重要阶段到来之际，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这次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从而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化。相比而言，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年来有的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灾等，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各自的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并且，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

安问题等，是当前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四个尊重”的重要政策思想，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的前提，进一步突出了“四个尊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既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各方面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发展愿望。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当前，一是要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二是要从制度上保障竞争机会的平等。当前，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机会的平等特别是竞争起点的平等。三是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以改革的办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重点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的完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有些政策前后矛盾、互相打架的情况，导致一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改革发展成果。这种现象必须努力克服。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特别要关心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群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呈现经济

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要继续采取有效扶贫帮困的社会政策，确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同时，还要认真解决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者权益维护中的实际问题。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当前，要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国际经验表明，群众团体、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现在，我国传统单位制的社会结构正在向多样化的方向转变，但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而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要求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分别明确了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和公民广泛参与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大量“单位人”向“社会人”特别是“社区人”转变，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各种组织来承担。但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社会功能的不完善，许多公民的各种公益性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全面满足。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各种社会团体14.2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多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团体的发育还很不健全，法制还不完善，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曾经出现过和尚未出现过的各种突发事件。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现。在做好传统领域工作的同时，对卫生、信息、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对防范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必须切实予以加强。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包括信息采集和自动汇总机制、网络应急指挥机制。

资源动员机制、社会治安保障机制等。设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突发事件的诱因。把应对突发灾难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突发灾难应对基金监管、物资储备、民间援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戒严法、国防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具体的紧急状态法律。但这些单行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并且对紧急状态下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也不够清晰。因此，应当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把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机制，明确公民、志愿者、专业团体、社会组织等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用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系。

进一步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2003年以来，到各级信访部门反映农村征用土地、城镇居民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的明显增多，重复上访和集体上访现象比较突出。要解决信访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抓起，认真解决导致信访产生的各种问题。同时要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畅通信访渠道为主线，以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为核心，以基层信访工作为重点，依法保护群众正当的信访权利，依法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上访行为。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不断完善常年接访、定期约访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抓住热点、难点问题，立足于早发现、抓苗头，把各类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作者系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

陆学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新的理念，也是一项新的任务，是适应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很快取得了共识。同时，这也是贯彻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历史任务，而且是一项新的任务，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建设，现在加进了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不久前，已经提出了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与经济建设等并列，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奋斗目标更加完整，目的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对前一阶段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过程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曾一度陷入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由此造成社会发展滞后，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校正。

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结构，好比一个人的骨架一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一般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互为表里，相互匹配。现代社会既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前一阶段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投入相对就少了。古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城乡体制、就业、社保等体制，有的改了一些，有的改革还没有破题，有的改革基本上还

没有到位 所以现在的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还不相适应 还不合理 制约着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胡锦涛同志提出对社会结构发展调查研究 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 以利于通过改革和调整 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状况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我们初步的研究。

一、人口结构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2003年总人口为129227万人。这年出生1603万人,死亡827万人,出生率为12.4‰,死亡率为6.4‰,自然增长率为6.01‰,这些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年龄65岁上的老人为9692万人,占总人口的7.5%。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是老龄化国家,中国在2000年就达到7%,进入了老龄化国家。一般说,经济发达国家才成为老龄化国家,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重视人民健康等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当然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今后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等事业的任务艰巨。

在2003年总人口中,16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为99889万人。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6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0.5亿人,2010年将达到10.8亿人,每年增加1541万人。2020年达11.4亿人,2035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12亿人。未来30年,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政策得当,那么我们能够尽享劳动年龄人口众多的人口红利,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很有利的。但是要使这十多亿人充分就业,都能各得其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就业压力将是今后长期要解决好的难题。

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可以分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两部分。2003年我国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为23789万人,其中离退休5706万人,占24%;在校学生(16岁以上)4487万人,占18.86%;操持家务者6868万人,占28.87%;丧失劳动者4660万人,占19.59%;其他人员为2068万人,

占 8.69%。

2003 年的经济活动人口为 76100 万人，其中就业人口为 74432 万人，失业人口为 1668 万人。在城镇就业人员为 25639 万人，占 35.45%；在乡村就业 48793 万人，占 65.55%。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 13573 万人。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在 16 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4.7%，为 4498 万人，比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 1576 万人增加了 1.86 倍。高中及中专程度的占 14.4%，为 13781 万人，比 1990 年 8988 万人增加 0.53 倍。这 10 年由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全国 16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8.1 年。

农村 16 岁以上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不足 1%，高中以上的占 7.8%，小学以下的占 50% 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 6.8 年。这对农村劳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非常不利。

二、就业结构

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步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很不相称。2003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构成：一产 14.6%，二产 52.2%，三产 33.2%；当年全国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一产 49.1%，二产 21.6%，三产 29.3%。从上述经济结构看，农业与非农业的产值结构为 14.6:85.4，这表明工业化程度已经进入中期水平，但同期农业和非农业的就业结构是 49.1:50.9，这还是工业化初期的水平。这种结构偏差源于城乡结构不合理，又是造成当前农民贫穷的结构性问题。

前面说过，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有关部门测算，2007—2010 年，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在 1800 万人以上，除去死亡、退休等因素，每年纯增劳动力在 1000 万人以上。在新增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都要到城镇二三产业中就业。加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减弱，就业弹性系数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年均就业弹性系数约为 0.30，90 年代已下降到 0.11），所以，今后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城市化社会中，失业不仅是失去了工作，而且也失去了收入和经济来源，即使有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失业待业的人数多了，肯定对社会稳定不利，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就业又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有关部门已经提出来了“就业优先”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城乡结构

中国现在已是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 2004 年城市化率只有 41.8%（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阻碍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 影响人民生活 and 消费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经在阻挠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另外，在占总人口 41.8% 的城市人口中 约有 1.3 亿人是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和外地人口，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他们并没有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其中有 1 亿左右是农民工，他们干的是二三产业的劳动，但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农村的。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 二等公民。有人说 现在城乡二元结构进到城里来了 地方政府对本城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外地人对农民工是另一种政策，一城两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同处在一个城市社会中，城乡结构很不合理，而且城乡差距很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当今中国发生的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

四、区域结构

中国的地区差别本来就很大 发展很不平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以东中西三部的上海、河南、贵州相比较：

各地区人均 GDP 变化的比较 单位 元

地区	1985 年	1990 年	1998 年	2003 年
上海	3855	5818	28253	46718
河南	580	1045	4713	7530
贵州	420	794	2324	3601
上海:贵州	9.18:1	7.33:1	12.06:1	12.97:1
上海:河南	6.65:1	5.49:1	6:1	6.2:1
河南:贵州	1.38:1	1.32:1	2.03:1	2.09:1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到 1990 年以来，上海和河南的差距从 5.5 倍扩大到 6.2

倍，和贵州的差距从 7.3 倍扩大到 13 倍。河南和贵州的差距也在扩大，从 1.3 倍扩大出口到 2.1 倍。地区之间如此大的差别，在国际上是少见的。2002 年欧盟 15 国 24 个地区之间最大的差距只有 2.4 倍。

究其原因 除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历史原因外 近些年来 东中西部的差距之所以急剧扩大，实际上是城乡差距扩大的反映。上海主要是城区，而河南、贵州主要是农村 如以上海、郑州、贵阳相比 差距并不大。还有个原因是上海市场化程度高，而河南、贵州的市场化程度低。另外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形式 大量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04 年上海外来人口达到 536 万人 北京 400 多万人 江苏、浙江都有近 1000 万人 广东最多 有 1800 万人以上。而河南流出的劳动力为 500—600 万人，四川约 600 万人 安徽 400 万人 江西 300 多万人 贵州流出的也超过 300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青壮年劳力，也有一部分是有高学历的人才。他们创造的巨额财富都留在输入地了 使富者愈富 这也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 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地区差距还会扩大。

五、社会阶层结构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形成了由不同的阶级、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就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1949 年以后，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实行国家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进行改造 到 1957 年，全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 对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理论 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论，但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组成相对简化了 则是事实。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 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我们课题组经过长期的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2001 在全国 7 亿多就业人口中 下同 占 2.1%。

2. 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约占 1.5%。

3. 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佣 8 人以上的企业主，约占 1%。

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是脑力劳动者，拥有文化资源优势，约占总就业人员的 4.6%。在特大城市、大中城市 这个阶层的比重要高很多。

5. 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 约占 7.2%。

6. 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少量资本 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 雇工在 7 人以下的小业主、工商户 也有称自雇佣者的 占 7.1%。

7. 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约占 11.2% 其中约 1/3 是农民工。

8. 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员工，他们占 17.5% 其中农民工已占大多数。

9. 农业劳动者阶层 指承包集体耕地 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 并以此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 约占 42.9%。

10.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这部分人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国企改革、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等原因 大量增加 约占 4.8%。

现在形成的这个社会阶层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但还只是一个雏形 正在继续发育成长。为什么这样判断？首先，现代社会应有的社会阶层，中国都有了 今后只是各构成阶层的规模、比重会变化 但构成的阶层不会再有大的变化。其次，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序已经确立，今后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各阶层内的人员是可以流动的。

第二，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1978 年以前，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 凡是出生在农业人口家庭 只能从事农业 只能做农民 凡是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为工人 工人想转为干部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 限制了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 很不公平 也不合理 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逐步改革了这种体制，社会流

动渠道逐步开放 越来越多元化 使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 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

第三，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下 但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 自然、自发形成的 还不合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要求还不相适应。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上述中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状态 就影响、形成、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的构成和状态，所以说，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体现。

从世界各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一定是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个阶层结构是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无例外的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 所谓两头小 是指拥有各种社会资源很多 处于最高和较高地位的社会阶层 其规模很小 而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很少 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的规模也小；所谓中间大，是指这个社会已经培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有的国家也称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 足以使他们过上小康乃至更高水平的生活 他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个国家也就实现了现代化。

比较而言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 离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就结构形态而言，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形态。就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规模来说 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就是 该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该小的没有小下去，是指农业劳动者阶层应该继续缩小。前面说过，2003年我国 GDP 中 农业只占 14.6% 但因为户口、就业、城乡体制的限制，农业劳动者阶层还占 42.9%。

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使这个阶层能降到 20—25% 以下 就比较合理了。

该大的没有大起来，是指社会中间阶层（有的国家也称中产阶级）应该有较大规模扩大。据我们课题组测算，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 1999 年为 15%

左右，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好，平均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2003年已经接近20%。如果我们能深化改革，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引导、调控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达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的结构，就能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如何实现这个战略性的任务，从社会结构理论来说，就是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该小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使该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这是我们今后要特别加以重视并做好的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启示

房 宁

2005年1月在美国策动的新一轮“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又一个政权吉尔吉斯斯坦政权被颠覆了。这是2003年11月以来中亚地区继乌克兰、格鲁吉亚之后第三个被“颜色革命”击垮的政权。但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的猛烈冲击，也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经受住了“街头政治”的考验，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多次取得胜利，顽强地生存下来。“街头政治”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它的不同结果值得我们深思，必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一、改革和社会转型期是执政党丧失阶级基础的危险期

改革和社会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导致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执政资源发生变化。一方面，原来的阶级基础即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逐渐与党疏远。另一方面，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希望独立发挥作用，与执政党的历来的政策发生冲突。结果，执政党就可能面临既失去原有阶级基础，又未能建立新的基础的危险局面。执政党表面上代表全社会利益，而实际上并没有与某一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结成利益共同体，党的执政基础就会空洞化，其社会表现就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

二、依靠人民群众是巩固政权的根本

反观委内瑞拉的形势，则与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截然不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外有美国强大的压力，内有强大的经济界、政界反对派，军队内部也有分歧。但查韦斯政权不畏艰险，敢于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外来干涉和内部颠覆。这种在异常复杂恶劣环境中巩固政权的“委内瑞拉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分析总结。从根本上看，查韦斯之所以能够一再地化险

为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得到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占委内瑞拉人口 70% 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委内瑞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深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荼毒，阶级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之后，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和具有左翼倾向的查韦斯掌握了国家政权。查韦斯上台之初，政权基础薄弱，社会形势动荡。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查韦斯采取了中左的社会政策，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政策调整，使利益分配格局向社会中下层倾斜，以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建构政权的社会基础。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查韦斯及时地利用新自由主义在委内瑞拉之外的其他拉美国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事实，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争取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基层进行组织训练，进一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使国家政权在基层扎根。

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视查韦斯及其政权为眼中钉，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颠覆，“街头政治”是他们使用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敌对势力发动了多轮政治动乱冲击委内瑞拉国家政权。查韦斯政权能够在极大的压力和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广大劳动阶级的支持。反对派发动抗议示威，就有声势更为浩大的支持查韦斯的游行示威。反对派征集社会签名要求全民公决，查韦斯就能在全民公决中胜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动大罢工，企图在经济上摧毁委内瑞拉及其政权，查韦斯就乘机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接管企业，把更多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利益，进一步树立政府威信，巩固政权基础。

尽管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政治格局下，委内瑞拉现政权处境仍然十分艰难，未来风险很大，但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到今天，说明查韦斯政权的路线是正确的，其经验具有启示意义。

三、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三点启示

观察和比较街头政治的两种不同结果，其背后的规律值得注意。

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改革和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利益格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相应地，社会进入矛盾的多发期。在这一时期，执政党将面对更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出现反对派，这是正常的。有反对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坚定地支持政权、执政党和政权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中亚地区的一些政权面对的反对派势力并不十分强大，政权却一触即

溃，总统孤家寡人，仓促出逃。而查韦斯从容面对美国的重压和国内连续的冲击，坚持不倒，得益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很难想像查韦斯能坚持下去，而没有查韦斯的阶级路线和政策调整，群众就不可能支持查韦斯。

有了群众支持，国家机器才是政权的可靠柱石，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动乱时，原政权在形式上也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但它们在强大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冲击下，不敢使用军警，军警甚至出现临阵倒戈的现象。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虽然这与查韦斯是军人出身、与军队有密切关系有关，但从根本上看，军队之所以支持查韦斯政权，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委内瑞拉军队是在多数人民支持查韦斯的情况下，站到政府一边的，毕竟军队的基层官兵基本上来自从查韦斯政策中受益很大的下层劳动阶级。

必须重视群众工作，进行利益调整，加强宣传教育，构建新的基层组织体系。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近来垮台的独联体国家政权在组织上脱离群众，表现为执政党高高在上，缺乏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的基层网络和体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中，总统已经逃到俄罗斯避难，支持总统的势力才在其家乡组织了千人声援，简直是贻笑大方。反观委内瑞拉政府，近年来在调整社会政策、向劳动人民实施利益倾斜的同时，非常注重基层工作，派遣大批支持政府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学生深入厂矿、乡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正是由于事先有如上大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在社会动乱面前，查韦斯政府才能一呼百应，依靠人民支持度过险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